



我在中央党校的硕博时光

□ 娄季芳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时光如梭，从我第一次踏入颐和园东门外的自得园（中央党校研究生院）至今已17年了。

曾经，中央党校是一个遥远的存在，我只在报纸或新闻上知道她。2005年，我读大三，决心考研，就萌发了报考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的想法。然而对她的情況知之甚少，直到研究生报名时才知道她每年只招100名硕士，分布在十几个学科，我所报考的世界经济专业仅招5人。但是，开考没有回头箭，只能下决心全力以赴。

我考试的过程，也比较“惊悚”。党校的专业课出题风格“独一无二”，客观题多分值少、主观题少分值高。其中有一道论述题是50分，当我看到题目时直接蒙了，感觉不是自己熟悉的问题，思忖好长时间才冷静下来开始答卷。考完出来，我自认为考砸了，大哭了一场。寒假尚未结束，我就开始返校复习，计划“二战”考研。开学后，同学们喜讯频传，只有我的成绩迟迟不出。就在大家都以为我落榜了的时候，突然收到了面试通知，更出乎意料的是我的总分很高，是专业第一名。复试依然“惊悚”，虽然面试老师和蔼可亲，但我却始终高度紧张，以至于连题目也没听清楚，只好让老师又复述了一遍，好在回答基本准确。于是我被录取了。往事历历在目，如今回想起来，能进自得园里读书，当年无论付出多少辛苦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刚踏入自得园时闹了一个笑话。复试结束后，大家都在自得园里信步走走看看。那时园里散布着很多旧房子，走到湖南面的假山后，发现四排破旧的平房，红砖外墙，房顶铺着的油毡油布在风中飞舞。大家纷纷议论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特别笃定地说是仓库。入学后才发现这居然是我们的宿舍，名为“四排房”。四排房是单元房，一个单元有三个卧室一个卫生间，住5个人。我们宿舍的后窗正挨着一墙之隔的颐和园公交车站，早上5点就开始有公交车进出，地面都跟着震动，刚开始经常睡不着觉，后来居然习以为常。

四排房虽然简陋但充满欢声笑语。饭后，同学们围湖散步，聊的都是各种社会热点，天马行空的闲谈点燃了一些同学的创作火花，有人手快写了热评，不久居然发表了，拿到稿费请我们吃了一顿。没课的时候，我们相约在自制的乒乓球台上打比赛，观战的人比参赛的人还多，于是大家给它起了个洋气的名字叫“街头乒乓”。一年多后，我们从

四排房搬到了新竣工的研究生宿舍，是三层的楼房，推开窗就能看到自得园的湖景和颐和园的万寿山，真称得上是“天翻地覆”的改善。

党校研究生教学很有特色。专业课是小班教学，以研讨式教学为主，第一节课由任课老师导读，学生认领后续的讲课。每节课由一位学生主讲，其他人以提问的方式参与讨论。为了讲好自己认领的课，我常常连续奋战好多天，查资料、找数据，有时为了搞明白一个理论难点，往往研究到深夜。这样的教学方式务实有效，充分激发了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有一位中国哲学专业的同学，因为专业课授课采用辩论的方式，他常和两位老师一起同桌辩论，这使得他思路开阔、能言善辩，读书期间就开始在国家图书馆作公益讲座，毕业后写了好几本畅销书。

党校老师对学生关爱有加。除在课堂讲授之外，教研部还专门指定一位年轻教师作为研究生联络员，密切关注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思想动态，经常和学生们交流谈话，并给予很多教诲和指导。记得有同学写论文熬到下半夜，晨昏颠倒，影响了白天的上课，这位老师特意提醒我们说，学习要讲究效率，应提高投入产出比。

研究生的课程，包括公共课的含金量都很高。一些校领导和知名学者都亲自给学生上课，如刘海藩、杨春贵、王东京等。印象最深刻的是杨春贵副校长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虽然当时他已年逾七旬，但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声如洪钟，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逻辑严谨、思路清晰、口齿流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还有朝鲜问题专家张琬瑰老师，他用生动幽默的语言讲述朝核六方会谈问题，把复杂的国际形势分析得非常透彻。还有卓泽渊老师讲法学理论，举了很多生动的案例，并在课后即兴赋诗一首，被大家称为“法学家中的著名诗人和诗人中的著名法学家”。

每周五上午是“部长讲堂”，是全校学员都上的大课。部长们讲课大多是介绍本部门最新工作情况，可谓站位高远、内容鲜活，很有启发意义。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时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和时任外交部部长杨洁篜的讲座。李荣融介绍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取得的重大成果，他深入浅出、全面客观的讲解，启发我把经济理论同现实国情更好地联系起来，增强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认同。杨洁篜着重讲解了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使我开阔了视野，树立了国际化思维。

社会调研是一个重要收获。硕士二年级的暑期，我有幸跟随国际战略研究院的调研组赴重庆开展社会调研，通过对农村和企业的走访参观和座谈，对低保政策、新农合、乡村特色产业等有了实际的了解。这对于一直在大学“象牙塔”里读书的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实践经历，使我认识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并有了对“实事求是”治学精神的初步体验。在以后的学习中，我不再“人云亦云”和盲从，而是逐渐学着从事情的本源着手，经过缜密思考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

研究生院的管理称得上是“严宽相济”。一方面，纪律严格，要求很高。出门不拔房卡、宿舍里吸烟都是违纪，违纪者会在外网通报批评，使得大家常常警醒自己千万别成了“网络名人”。另一方面，很尊重学生利益。为了改善食堂服务，院方组织学生与食堂“谈判”，最后换了食堂经营者。

硕士毕业后，我又考取了中央党校的博士研究生，继续学习深造。为了写好博士学位论文，我精心学习研究当时最流行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可是论文开题时，我“精心准备”的计量模型却被导师批了，他说研究问题必须注重“实事求是”，研究方法固然重要，但必须与研究方向和论文内容相匹配，不能“喧宾夺主”。我反思自己的思路问题，对论文进行了大的调整，尽管付出了很多辛苦，但方向是对的，最后论文得到了好评。这又是深刻的人生一课。

在自得园的6年时光，“实事求是”成为刻入我骨子里的人生准则。我老老实实做人、脚踏实地工作，认真真学习研究，思想和行为都更加务实和稳重。毕业后，曾与一位多年未见的大学室友聚会，她评价我与从前相比简直就是脱胎换骨、判若两人。我想这是客观真实的评价。党校研究生院的学习经历使我开阔了视野，增强了求真务实的意识、培养了乐观积极的心态。自得园的6年学习生活是我永远铭记的美好时光！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

古诗词中的劳动

□ 张立敏

代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等。

渔、樵、耕、读，即渔夫、樵夫、农夫、书生，是中国农耕社会四个比较重要的职业。先秦时期，渔业就在诗中出现了，战国时期屈原的诗中出现了渔父形象。描写渔业的生活，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大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劳动之歌。举凡农耕、渔业、林业、蚕桑养殖、交通、盐业等几乎所有劳动场景和劳动习俗，在古代诗词中都有体现。从情感表达来看，劳动诗词的情感内涵非常丰富：通过对劳动场景、劳动过程的生动展示，或表达对劳动的赞美，或表达对劳动人民艰苦劳作的同情，或抒发寄托于劳动之上的情怀。这些古诗词承载着劳动的历史、承载着深沉的情感，深深地镌刻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被世代代永远传诵。

农耕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生产劳动方式，因而诗词中展示农耕生活的篇章最为普遍、数量最多。《诗经》中的《七月》，反映的劳动形式丰富多样，有修农具、采桑叶、发衣服，还有种水稻、高粱、麦子，整修房屋、田间送饭等生动场景，这是西周早期社会的“农业百科全书”。“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这首《芣苢》写出了劳动人民在劳作中的积极乐观精神，洋溢着轻松欢快气息。唐代丘为在《题农父庐舍》中，写春耕时节平整土地的情形，“沟塍流水处，耒耜平芜间。薄暮饭牛罢，归来还闭关”，突出了农民辛勤劳作的场景。一些诗歌则反映农人之苦，其中以唐代李绅的两首《悯农》诗最为有名。“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是农民艰苦劳作的真实写照，而“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写出对农民困顿生活的不平与悲愤。唐代白居易的《观刈麦》中，“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写出了农民在炎夏日里早出晚归割麦的艰辛劳动。难能可贵的是，看到农民食不果腹的贫困生活，诗人用“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诗句进行自省，以表达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此外，也有一些农事诗或寄托诗人超然物外的退隐情怀，或描写农家的幸福田园生活，如晋代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三》，宋代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等。

我国是桑蚕业的发源地，种桑养蚕历史悠久。先秦诗歌《十亩之间》写道：“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虽然篇幅短小，聚焦于采桑女子呼伴同归的桑园晚归场景，却生动地写出了采桑人的轻松愉快，是一首欢快的蚕桑养殖之歌。东汉乐府民歌《陌上桑》叙述了采桑女秦罗敷拒绝使君的故事，讴歌了劳动人民不屈服权贵的精神，从侧面反映了桑业劳作。宋代翁卷的《村景即事》写出四月农村的繁忙农事活动，“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从中可以看出，至少在南宋时期，劳动人民既种地耕田，又采桑养蚕，从事着多种劳动产业。

矿业在农耕社会的劳作中并不占主要地位，但在古诗词中也有反

映，其中写金矿和玉石开采的两首诗歌，颇为有名。唐代刘禹锡的《浪淘沙·其六》描绘了一群妇女淘金劳动的情景：“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写清晨江上大雾弥漫，太阳出来后雾气散尽，江中的小洲忽然呈现在眼前的生动画面。这时人们看到，三五成群的淘金妇女结伴而来，开始了一天的劳动。而“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则是写诗人感叹劳动人民用勤劳劳动为权贵阶层提供的奢靡生活，传达了对社会不公平的愤慨。唐代李贺的《老夫采玉歌》，既写出矿石的品质要求“采玉采玉须水碧”，又写出恶劣的饮食状况“老夫饥寒龙为愁”，“夜雨冈头食蓁子，杜鹃口血老苍泪”；而“泉脚挂绳青袅袅”写出了在悬崖峭壁采矿的险恶条件，突出采玉矿工的凄苦生活。白居易在《卖炭翁》中塑造的那位“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老翁形象和他的一车炭被掠夺的悲惨命运，深深打动了后世读者的心。

盐业是一种古老的产业，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苏轼都写过有关盐业的诗篇。北宋词人柳永在昌国县（今浙江定海）任晓峰盐场监官之时，目睹了海边盐民“晨烧暮烁堆积高，才得波涛变成雪”的悲惨生活后创作了《鬻海歌》，反映盐民的深重苦难，表达了自己渴望太平世道、减轻赋税和革除盐铁弊端



抗倭名将谭纶

□ 胡小红 徐伟鹏

藉，流血被原野”。谭纶于南京一战后以剿倭闻名，受到朝廷重视。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八月，朝廷将其调任台州知府，而台州正是当时倭寇肆虐最猖狂的地区之一。从此，谭纶投入全力抗倭作战中。

转战东南抗倭。谭纶八月任职，十月即有“倭二百人登乐清，流劫瑞安、平阳，守备都指挥刘隆战死”的不利战况。尽管倭寇凶狠，情况紧急，但谭纶的应对之策却极为沉稳有力，他“主率守卒千人三战三捷，倭不敢复入犯”。虽然首战告捷，但谭纶并未被之冲昏头脑。经过仔细研判，他发现各地兵备废弛严重，认为“郡兵盈万皆阘懦，不敢交锋”，看似军威声壮，实则不堪一击的情况，是每次进犯的倭寇皆能轻易转战深入、如履无人之境的重要原因。因此在请示总督胡宗宪同意后，谭纶马上着手训练新兵，“立束伍法，自裨将以下节节相制。分数即明，进止齐一，未久即成精锐。”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谭纶因战功而被擢升为浙江巡视海道副使，此后仍继续扩充精锐部队，“选有力能举二百觔以上者，而教以荆楚剑法、杨家枪枪法、方圆行阵诸兵法。”这支队伍不久又与刚刚训练完成的戚家军会合，由谭纶统一调度，最终成为转

战东南、抗倭杀敌的一支劲旅。谭纶率军一路势如破竹，通过三次大规模战斗取得了浙江境内抗倭之战的决定性胜利。

倭寇在浙江失利后仍旧贼心不死，很快又转身进犯福建。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福建告急，朝廷遂对正在为父守丧的谭纶夺情起复，命他以都察院右金都御史的身份提督福建军务兼巡抚，总领全省御倭军事，并派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供其调用。四月，经过周密准备，谭纶令刘显率军居左，俞大猷率军居右，戚继光居中，对敌发起决战。据《明世宗实录》所载，“及战，继光先进薄贼巢，左右营继之，四面合围，因风纵火，贼死战皆灼烂，集中心尸及霰，无一得脱者。”此后形势逆转，明军军心大盛。谭纶亦继续乘胜挟威，经过一系列战斗，最终在仙游击溃倭寇两万余人，一举取得了抗倭的彻底胜利。

北调镇守边关。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北方告警，朝廷命谭纶出任蓟辽总督。谭纶深知蓟辽边地担负着拱卫京畿的重大责任，且所临之敌为蒙古骑兵，又非倭寇可比，当慎重对待。因此甫一上任，他便审慎研判敌情，提出三点用兵对策。首先，“敌聚攻，我分守，众寡强弱不侔”，故应抓紧训练三营新

古代交通有陆路交通和水上交通两种。李白的《丁督护歌》写当时交通的不便与拖船的辛苦。“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点明该地是交通要道、商贸中心。“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则描写了船夫冒着酷暑拖船的艰苦情境。繁华之地的劳动者处境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古诗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个体人格塑造与社会秩序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古代诗人用诗意的语言辞藻、多彩的情感意向、丰富的表达形式，记载了历史上的劳动画面，书写了劳动体验和劳动知识，阐发了对待劳动和劳动者的看法与态度，以及劳动在当时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既富有思想性，又充满审美价值。劳动诗词代代传诵，成为连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纽带。几千年来，它陶冶和影响着华夏儿女辛勤劳动、开创未来的信心和勇气，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宝贵精神财富。



军，并奏请“授继光以总理练兵之职”；其次，“秣马厉兵，角胜负呼吸者，宜于南；坚壁清野，坐制侵轶者，宜于北”，故应加固长城，修筑敌台，扼守要害，形成系统纵深、互为犄角的战略防御体系；第三，胜负在瞬息之间，为防多方掣肘、功亏一篑，应赋予前方将领专事之权。

明廷经首辅支持，同意谭纶的奏策，并予以推行。果然，经过一段时间的苦心经营，“边备大飭，敌不敢入犯”，北方边境迎来了长达十年的平静时期。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四月，谭纶因病卒于兵部尚书任上。《明神宗实录》评价他“自郎署至中枢，始终兵事者几三十年，计首功二万一千五百有奇，可谓矫矫虎臣，腹心干城矣”。

谭纶忠心为国，不计名利，尤其在抗倭斗争中表现出的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和克敌制胜的战争谋略，值得后世铭记。



庆祝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

我与中央党校